中国共产党通史

（插图本）

第二卷（下）

主编　张静如

广东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共产党通史

（插图本）

第二卷（下）

主编　张静如

广东人民出版社

第二卷

(下)

郑 谦 张 化 孙大力 / 编著

目　录
（下）

动乱与抗争 …… 651
（1966 年 5 月—1976 年 10 月）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 653
一、“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 653
二、“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 666
三、“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 …… 682
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700
第二十一章　从“天下大乱”到“一片红” …… 722
一、“一月风暴”与全国性夺权 …… 722
二、“二月抗争” …… 730
三、“三支两军” …… 738
四、“天下大乱” …… 745
五、走向“一片红”的曲折之路 …… 752
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 763
第二十二章　“斗、批、改”运动 …… 775
一、天下初定 …… 775
二、“斗、批、改”的指导思想与方法 …… 788
三、“斗、批、改”的内容 …… 803
四、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及其调整 …… 830

第二十三章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阴谋 …… 839
一、利用动乱攫取权力的林彪集团 …… 839
二、九届二中全会 …… 849
三、批判陈伯达与整风 …… 860
四、“九一三”事件 …… 870
第二十四章　周恩来1972年的整顿及其受挫 …… 882
一、初期的“批林整风”运动 …… 882
二、“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认识上的变化 …… 893
三、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和对各项工作的整顿 …… 898
四、江青集团反对批判极左思潮。周恩来整顿被迫中断 … 923
五、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 934
六、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 940
第二十五章　从“批林批孔”运动到四届人大的召开 …… 951
一、反击“右倾复辟回潮” …… 951
二、批林批孔运动 …… 961
三、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 …… 971
第二十六章　邓小平主持工作与全面整顿 …… 982
一、把工业发展和国民经济搞上去 …… 982
二、整顿军队，加强国防 …… 1000
三、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 …… 1009
四、邓小平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 1018
五、文艺政策的调整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立 …… 1025
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和整党的初步措施…… 1031
七、江青集团的反扑与全面整顿的中断 …… 1043
第二十七章　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 …… 1049
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得人心 …… 1049
二、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抗议运动 …… 1057
三、江青集团的反扑 …… 1069
四、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 107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走向历史转折 …… 1083
（1976 年 10 月—1978 年 12 月）

第二十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 1085
一、“左”倾指导方针的延续 …… 1085
二、“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及其遇到的抵制 …… 1092
三、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国家正常秩序的恢复 … 1099
四、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复和“新跃进”的发动 …… 1112
第二十九章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伟大转折的序幕 …… 1122
一、拨乱反正的艰难步履 …… 1122
二、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1136
三、历史转折的前奏 …… 1154

动乱与抗争

(1966 年 5 月—1976 年 10 月)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一、“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施特劳加尔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过去耽误太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不过教训总结起来很有益处。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①

邓小平讲这番话时，“文化大革命”已结束了近11年。正是在这11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这11年对“文化大革命”痛苦而又深刻的反思中，在这11年对整个世界发展趋向冷静、科学的观察中，邓小平提出了这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教训。

邓小平讲这番话时，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行了近40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已进行了整整70年。在数十年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经过了多次的变化和飞跃，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已经大大地发展和深化了。

但是，在我们刚刚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在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处于幼稚阶段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主义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实践又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中国刚刚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当时被全世界公认为社会主义惟一模式的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他认为，苏联模式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建设道路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各自的具体情况进行探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用于超越苏联模式的思想资源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有中国历史上大同世界的种种描述，更有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丰富而又成功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经验。1958年“大跃进”的尝试，虽然带有超越苏联模式的强烈愿望，但其中许多内容却往往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相左。例如，忽视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对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重要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甚至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乃至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等等。在60年代的调整中，在纠正“大跃进”失误的过程中，在修复传统模式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对传统模式改革的积极探索。例如“包产到户”的提出和一系列有关发展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教育的条例的制定和实施。这些条例和措施的后面，都反映了一种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认识。问题在于，在当时的条件下，苏联传统模式及其派生出来的一些模式（如带有某种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模式）还具有深远的传统和强大的影响，再加上当时整个国际形势方面的诸多因素，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这样，调整时期产生的这些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与传统观念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发展了。

1966年5月7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夕，毛泽东在林彪的一个报告上所作的批示（即“五七指示”）中，又一次比较系统地谈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看法。他说：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

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①

最后，毛泽东指出：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②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反映了他当时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设想。这些设想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有

---

①② 《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供内部学习），第227—229页，1968年11月编印，1969年8月（北京）再版。

了一定程度的表现。在随后的调整时期，毛泽东根据自己对1958年经验的总结和思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沉的思索。他放弃了“大跃进”时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发展了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长期性的认识。然而，随着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意见分歧的加深和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毛泽东却在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想中进一步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内容。这些新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一些文件——如《五一六通知》以及《五七指示》——中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

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五七指示》与“大跃进”、人民公社有许多近似的地方，它反映出毛泽东心目中所向往和憧憬的社会主义一些重要特征。这种社会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它以阶级斗争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保障，对生产者个人来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等人利用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把广大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搞所谓“在艰苦的劳动中努力改造世界观”活动。图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的学员们在劳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说，则以阶级觉悟作为压倒一切的激励源泉。在这个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实行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对于商品生产，虽然不能不借助它来发展经济，但因其资产阶级的属性，必须加以限制。社会分工虽然是当前生产所必须，但因其会导致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平等，也要加以限制，并应创造条件使其逐步缩小。在分配领域中，也应缩小差别，甚至可以实行大体平均的供给制。因为物质刺激总会诱发人们的物质欲望，直接威胁到道德的纯洁和高尚，导致精神的堕落，而革命的理想和阶级觉悟能够提供最强大和持久的动力，使劳动者能够并乐于完成任何艰难困苦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种社会可能并不那么富裕，但这可能正是它的优越性所在，因为在一个富裕或高度富裕的社会里，人们总是会付出精神堕落和社会主义变质的代价，等等。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的这些认识，既反映了马克思经典作家当年对未来社会的某些构想，也包含了他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的认识和超越意识；既有我国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经验和军事共产主义的深刻烙印，也有中国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影响。《五七指示》所展示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虽然包含有一些大胆的设想和富于想像的预见，体现了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追求，但从总体上来看，它是不现实的。它忽视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一种社会形态的决定性作用，脱离了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时期的主题，忽视了商品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它把以残余形态存在着的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希望用不间断的阶级斗争和限制分工、限制差别、限制物质利益等方式来取得对战胜资产阶级的保证，这些都带有经验主义和空想主义的色彩。毛泽东在 1966 年提出的这些设想，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抗日根据地时已经这样做了，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在革命战争时期有效的经验，在军队里是正确的做法，是不是能无条件地推广到整个社会，特别是推广到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主义是需要发展、需要改革

的，但这必须以生产力的现状与发展为出发点；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弘扬战争年代的革命传统，但不能简单地直接搬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的，但它也是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正确与否也必须由实践来检验。

5月15日，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在转发指示中指出，《五七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8月1日，为庆祝建军三十九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社论公布了《五七指示》的部分内容，并给予它极高的评价：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这篇社论发表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高潮时期，也是因学生造反导致全国迅速走向“天下大乱”的时候。“大破”高潮中所展示的“大立”的远景，在1968年开始的“斗、批、改”运动中开始被付诸实施。它深入到几乎所有部门、领域，表现为无数的实验、典型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但大部分都没超出《五七指示》所勾画的范围。这种对社会主义认识及其在党内引起的分歧，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追求，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

如果说在“大跃进”时期，党内在有关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上

的分歧还处于萌芽状态的话，那么，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调整时期，这种分歧逐渐发展了。这种分歧直接表现为1957年至1966年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两个发展趋向。

在两个发展趋向中，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例如：在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刘少奇、周恩来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有关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讲话，陈云有关“三为主、三补充”的重要思想，邓小平有关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的党建思想，1958年年底至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刘少奇等在纠正“大跃进”错误时所提出的一些有关重视经济规律、重视发展商品经济、重视按劳分配、国民经济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不能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等重要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及在调整时期所取得的一批重要成果，等等。

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主要有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错误往往是因为真理越过了界限而产生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力争现实可行的、讲求效益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较高速度，这本来是必需的、正确的。越过这个界限，追求主观臆想的、盲目冒进的高速度，这就是错误的了，并且带来了严重破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上，重视在一定范

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警惕和平演变和出修正主义的危险，这也是正确的、必需的。看不到这种斗争和危险，是十分错误和危险的。但是，越过真理的界限，把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对和平演变的形势作出不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夸大估计，把许多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当作“修正主义”来反对，那就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了。

同时，还应看到，在这十年曲折的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与错误的发展趋向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这两种发展趋向，在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它们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存在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之中。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毛泽东是“大跃进”的积极倡导者，但他又是最早发现“大跃进”的错误并着手纠正这些错误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虽然一直坚持“大跃进”的一些基本设想，但他又支持了60年代初期中央一线领导的一些重要的调整措施。他虽然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但他又要求阶级斗争不要妨碍当时的经济调整。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时期，在60年代的调整中，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改革色彩的重要思想和政策措施。对于1963年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他基本上是低调的和比较消极的。但在“四清”运动中，他虽然不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类的提法，但对当时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他的估计也是显得过于严重了。

一方面是党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一方面是两种发展趋向的复杂交织，而且，也应看到，这两种趋向同时都在发展。因为，如果只是“左”的错误单方面地发展，那也就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了。而如果只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也就发动不起来。只有当“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文化大革命”才有必要和可能被发动起来。当然，“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

无论在规模、程度、性质上都不能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量齐观，忽视了两者在质的方面的区别，也就无法理解“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

在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不能不考虑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世界形势的影响与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出现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各国在发展经济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全世界进步力量感到鼓舞，也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惶惶不安。自50年代起，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武装斗争此伏彼起，捷报频传，一浪高过一浪，旧的殖民主义国际秩序土崩瓦解。美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到处伸手，推行霸权主义，支持各种反动势力，镇压、破坏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受到各国热爱和平、追求进步的人民的激烈谴责。与此同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弊端的左翼思潮、学生运动、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也在迅速发展。特别是60年代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后，西方发达国家内广泛的反战运动更是空前高涨，沉重地打击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各国反动政府。“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便是这种振奋人心的形势的真实写照。

60年代以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出现了一些新的重大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别从南北两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甚至进行赤裸裸的战争威胁，这种情况使毛泽东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危机感。他多次向全党提出帝国主义会不会进攻中国，中国有没有亡国的危险这一类问题。他的这种担心显然是正确的。但他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现实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其引起的世界形势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注意不够。他从马克思、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的一些结论出发，认为战争与革命仍然

是当前时代的主要特征，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形势总的格局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面对着两个超级大国的巨大压力，毛泽东表现出敢于斗争的勇气和精神。他要求全党不要怕打仗，要准备美国人来打，也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但他过高地估计了很快就会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性，以及由这种战争引发的世界革命的可能性。这种估计使他一方面对世界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和乐观精神，一方面对处于两个超级大国压力下的国家安全感到忧虑。

这样一种全球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形势和左翼运动、思潮的高涨，这样一种对战争很快爆发的紧迫感，以及对战争与革命相互关系的乐观认识，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世界形势、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看法，进而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对国内形势的看法，影响着国内政策的走向。

从5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对斯大林模式的全面反思已经开始，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也已开始对苏联原有模式的改革。这种改革一度使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盎然的生机，但也难免因各自的历史传统、地缘政治、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以及各自领导人的不同经历、素质等等因素，产生了对改革的不同理解和实践，并因此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苏联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在没有先例的改革中，虽然针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进行了一些改革的有益尝试，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因历史的局限及个人的缺陷引起了混乱，并使改革逐渐陷于停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已经开始的改革，尽管还只是初步的，都是对原有模式和传统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的否定。例如，给地方和企业以较多的自主权是对高度集中的否定，强调劳动者的物质利益是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不得不限制人们物质需求的否定，注重发展商品经济是对传统观念中产品经济的否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然对各种形式的高度集权提出挑战，如此等等。这种否定对于那些经济已经比较发展、各种物质条件已经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